

民初時期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的古籍出版競爭

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 | 張家榮

* 前言

民國初年，伴隨外國資本主義的輸入，具備先進技術與創新觀念的私人出版企業迅速崛起。繼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商務印書館成立後，在民國元年（1912）、五年（1916）、六年（1917）、十五年（1926）時，分別又有中華書局、大東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店等著名私人出版機構相繼成立（這五間書局是近現代出版史上的五大民間出版機構，當時同業更有「商、中、世、大、開」之稱），而私人出版社也很快成為全國出版業的主體，改變了過去「官刻」、「坊刻」與「家刻」並立的傳統格局。此時，上海地區成為全國出版業中心，許多規模較大的出版社，在此紛紛創建集「編輯」、「印刷」與「發行」於一體的出版總部。近現代私人出版企業首推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此二家不論出版規模、發行種類與開業時間，皆為影響現代出版潮流與知識文化傳播的重要推手。

* 先後成立的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由出身印刷業的夏瑞芳（1871-1914，字粹芳，江蘇青浦〔今上海〕人）等人創立於上海，剛開始預設的印刷業務，只以承攬商業簿記、帳本、廣告傳單、名片的印刷為主，故以「『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為名。最初，商務印書館只是一家純粹手工業性質的小印刷所，其後銳意創新，不惜鉅資，多方延攬技術人才，考察東西各國文化，並不時開發、研製新式印刷設備與逐步擴充廠房、辦公室，成為了中國現代印刷事業的先驅者。

同時，商務也很重視人才延攬與培養。光緒二十八年（1902），夏瑞芳重金禮聘張元濟（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鹽人）加入出版編輯、管理團隊。張元濟出身清末翰林，不僅思想創新，特具遠見和魄力，經過他的號召，知名學者文人如蔡元培（1868-1940，字子民，浙江紹興人）、高夢旦（1870-1936，原名鳳謙，福建長樂人）、蔣維喬（1873-1958，字竹莊，江蘇武進〔今常州〕人）、杜亞泉（1873-1933，原名煒孫，字秋帆，浙江紹興人）等先後加盟入館，並制訂設想周到的編輯出版計畫，從此奠定商務出版事業的堅實基礎，商務亦逐漸在出版、文化、教育界產生重要影響。為了培養年輕一代的人才，他們更於宣統元年（1909）開辦了「商務印書館附設商業補習學校」，從宣統元年開始到民國十二年（1923）為止，補習學校共辦了七屆，前後畢業生共三百一十八人，這些人才日後除任職於商務印書館各部門，也有不少是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店等處工作的。（注1）

當時，正值內憂外患之際，社會劇烈變動，各式思潮風起雲湧，求新圖變更是思想主流。其順應時勢的出版主題為：

一、新式教科書

當光緒二十八年清政府頒布《欽定學堂章程》時，他們即意識到各省開辦新學已勢在必行，為因應新式教科書可能的大量需求，該館陸續編輯出版了全套可供中小學使用的各式《最新教科書》，迅速引發學校搶購並風行全國，辛亥革命（1911）後印行的《共和國教科書》也同樣獲得不錯迴響。

二、西學新著編譯

如出版嚴復（1854-1921，字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所翻譯的《天演論》、《穆勒名學》、《法意》、《群學肄言》、《名學淺說》等一系列西方人文社會名著，對於近代中國思想啟蒙與文化發展實具深刻影響。

三、中外文工具書

如由張元濟主持編纂的中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其影響力是有目共睹的；還有為知識分子提供學習西方語文、學術之參考，先後出版了如《華英初階》、《華英進階》等初學讀本及《商務印書館華英字典》、《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等外語字典。

四、古籍整理影印

為了編輯工作的參考需求，商務印書館很早就有計畫地廣泛蒐羅各式中外圖書文獻，從早期的善本專室「涵芬樓」到後來創建的總館「東方圖書館」，典藏在其中的大量珍貴善本古籍，則成了該館出版《四部叢刊》、《叢書集成》、《涵芬樓秘笈》等古籍叢書的重要資料來源。

五、各式新知、通俗雜誌

雜誌是一種與時代議題、社會關懷緊密連結的獨特文獻，商務印書館的雜誌出版乃是著眼於傳播社會新知與培養開明風氣的功能意義上。像是創刊於光緒三十年（1904）的《東方雜誌》即以弘揚學術、啟導國民為主旨，內容不但豐富嚴謹，亦不斷與時革新。又如宣統元年創刊的《教育雜誌》以「研究教育改良學務」為宗旨，致力於介紹世界新式教育、記載教育史實及報導教育趨勢。

民國元年元旦，陸費逵（1886-1941，字伯鴻，浙江桐鄉人）在上海創立中華書局，並以綜合出版社為營運目標。創建初期，為符合改朝換代的新時代教育需求，中華書局積極奉行「開啟民智」、「教育國民」的宗旨，在傳播科學、文化知識，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了很積極的作用。中華書局建立後不久，因出版教科書內容符合時代需求，擁有不錯的銷量，和商務印書館的競爭也互有領先，這讓他們的出版事業得到迅速發展，逐漸在出版業界佔有重要地位。同樣的，當時中華書局亦召集了大批專家學者參與出版工作，如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范源濂（1876-1927，字靜生，湖南湘陰人）、馬君武（1881-1940，字厚山，廣西桂林人）、徐志摩（1897-1931，原名章垿，浙江海寧人）等，並陸續出版了《新式教科書》、《中華大字典》、《辭海》、《四部備要》、《古今圖書集成》等各式頗具影響力的圖書。其開局後的編輯出版主題為：

一、新式教科書

中華書局是以出版教科書起家的。陸費逵實頗具遠見，他有鑑於武昌起義成功，伴隨著共和國新建，新式教材需求必然大增。他在辛亥革命前即暗中籌建新書局，並規劃編輯好全套

教科書，當民國成立後的春季開學日，一套符合新時代的《中華教科書》不僅廣為各校採用，也開啟了中華與商務的競爭之路。

二、字典工具書

如由陸費逵等人主編的《中華大字典》，收錄達四萬八千多字，雖繼承《康熙字典》的字匯與部首分類法，但也校正了《康熙字典》四千多條錯誤，再加上採錄了許多近代方言與翻譯新字、新名詞且附有插圖，故而大受好評還一再重印。其《辭海》亦注重收集新詞語，更能滿足一般讀者的查詢需求，與商務《辭源》同為暢銷辭書。

三、各式雜誌刊物

雖中華書局同樣以報導社會時事、傳播新知為辦刊宗旨，但他們的許多雜誌卻明顯是有意與商務所辦雜誌相互競爭而生的。如創刊於民國二年（1913）的《中華教育界》，不論報導內容、方向，都和商務《教育雜誌》很類似。其它，像是創刊於民國四年（1915）的《大中華》（梁啟超為主編），不論內容水準與資料豐富性，亦皆可與商務《東方雜誌》相媲美。

四、古籍出版品

為了編輯人員參考翻檢的需求，中華書局最初同樣附設有圖書室，隨著營運規模的不斷擴大，編輯所中附設的「藏書樓」則擴充成為了「中華書局圖書館」。除持續購入一般中外圖書，也積極蒐購各式善本古籍。這些豐富珍籍自然也成了該局編印《四部備要》、《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古今圖書集成》等古籍出版品的資料來源。

*「古籍叢書」的出版競爭

吾人觀察中華書局開店後的許多出版品項，就能明顯看到它與商務印書館競爭的意味。

例如，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共和國教科書》、《東方雜誌》、《婦女雜誌》、《學生字典》、《辭源》、《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小說月報》、《清稗類鈔》、《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等書刊，中華書局亦有《新式教科書》、《大中華》、《中華婦女界》、《新式學生字典》、《辭海》、《中外地名辭典》、《中華小說界》、《清朝野史大觀》、《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四部備要》等之發行。其中，「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在古籍叢書上的競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因為這些都是大部頭書，內容往往重複，雙方為了爭取讀者，必須在編輯上別具匠心才行。」（注2）事實上，《四部叢刊》與《四部備要》，不僅因發行競爭激烈而廣為人知，二書在日後所造成的廣大學術、文化影響，更是值得一談。

《四部叢刊》分為初編、續編、三編。初編於民國八年（1919）開始付印，民國十一年（1922）完成。共收書 323 種，8,548 卷（後又重印、抽換，增補至 8,573 卷）。續編出版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收書 81 種，1,438 卷。三編印成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收書 73 種，1,910 卷。初、續、三編合計收書 477 種，11,921 卷。它們所採用的底本，除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自藏外，更遍訪海內外藏書家的宋、元、明舊籍（注3），縮印成體式整齊的本子，並註明原書高、廣尺寸以存其真。從書名「四部」，可知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各書分類編排於其中，本叢書

乃繼《四庫全書》後又一部大型綜合叢書。其收書特點與學術價值，誠如學者所言：1. 常備舉要，實用為宗；罕見秘笈，兼收並蓄。2. 注重版本，精益求精；書貴初刻，擇善而從。3. 訪求善本，不遺餘力，海外珍帙，重返中土。4. 殘缺之書，多成足本，首尾完具，序跋不遺。5. 不改舊本，詳考精校，補脫正訛，有功來學。6. 影印存真，化身千百，善本珍籍，千古不泯。（注4）

《四部備要》的輯印於民國九年（1920）開始，完成於民國二十五年。前後共分五集，收書 351 種，共計 11,305 卷。從書名「備要」，可知當中所採集的书，偏重實用，如經部收有漢魏《十三經古注》、唐宋《十三經注疏》、《十三經清人注疏》等，此為研究古代經學的基本圖籍；史部收有《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等，這些是史學研究的常備用書；子部收錄有《荀子》、《韓非子》、《老子》、《莊子》等，常見的周、秦、漢、唐諸子皆備；集部則有《楚辭》、《蔡中郎集》、《李太白文集》、《東坡集》等，歷代詩文名家著作均收羅其中。全書亦為四部分類，且運用仿宋活字編排印刷，排印成整齊畫一的本子。其特點與價值為：1. 實用舉要，體例更加完備。2. 採用底本，多為精善校本。3. 取便研讀，多用注釋之本。4. 學須門徑，重視清人著作。5. 聚珍排印，古雅清秀悅目。（注5）

有趣的是，當時的報刊廣告中，吾人不僅可看到針鋒相對的實況，也能看到兩方針對書籍內容所採取的不同宣傳面向。例如，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出版的《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中，不知道是否為排版的刻意，在目錄前的緊鄰兩頁，正好就同時刊登了《四部備要》與《四部叢刊》的廣告。除了書價、出書日期、卷冊數、購買途徑等必要訊息外，雙方也都各有側重的訴求點。（注6）



· 《四部備要》與《四部叢刊》緊鄰的廣告。（圖片來源／臺灣學生書局 1969 年景印本《圖書館學季刊》）

中華書局的廣告文字，強調內容的比較：「天下事高低優劣，均從比較而來。《四部備要》係用聚珍仿宋版精印，其精美並世無兩，從來未有。……選讀書需用之書，孤本而非讀書所需者，均不各入。蓋為讀書而刻書，非抱殘守闕也。……延請耆宿，校至十三、四遍，無魯魚亥豕之訛。」

商務印書館著重推薦收藏對象與內容：「圖書館不可不備。《四部叢刊》係就經、史、子、

集中，精選人人必讀之書凡三百餘種。取捨斟酌煞費苦心，所采版本，尤極精善。……國學家不可不備。書經翻刻，難免訛誤；惟用照相影印者，庶免此弊。……藏書家不可不備。《四部叢刊》所選底本，皆經再三考訂，擇善而從。計得宋本四十二種，金、元本二十種，其他亦均為舊刻精鈔，萃海內外藏家善本於一編。照相影印，不失原有精神，當尤為藏書家所愛購也。」

* 結語

常言道，競爭與壓力反而會讓人成長，同樣的，近代出版社之間的出版競爭，也帶動、激勵了整體出版業的發展。在此仍以古籍叢書出版品為例。當《四部叢刊》初編出版後，至民國二十三年已印刷了 3 次，甚至前 2 次刷印數都超過 5,000 部，尚供不應求。《四部備要》的銷售成績，也同樣反映在印刷次數上（在民國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間，共有 4 次刷印記錄）。就在這股古籍新印潮流中，其它出版社也陸續加入出版行列。例如，由沈知方（1883-1949，原名芝芳，浙江紹興人）創辦的世界書局，順勢推出了《國學名著叢刊》（1924）、《諸子集成》（1935）等加入戰局，並以容易翻檢與物美價廉的特色，獲得不少好評。此外，章錫琛（1889-1969，別名雪村，浙江紹興人）所創立的開明書店，亦趁時出版了《二十五史》（1934）、《二十五史補編》（1936）等歷史類古籍叢書，同樣擁有不錯的評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古籍文獻保存、傳揚傳統文化知識的功能不但不因時代而褪色，反而與時俱進。近年來，除了實體紙本的重新精印出版外，《四部叢刊》、《四部備要》二書更以電子全文資料庫的面貌出現在讀者面前，這雖是當初編輯者始料未及的，但卻也應是他們所樂見的進步！

注釋

1. 高信成，《中國圖書發行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226-232。
2. 姚福申，《中國編輯史（修訂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 302。
3. 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長沙葉氏「觀古堂」、烏程劉氏「嘉業堂」、上元鄧氏「群碧樓」、日本東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等。
4. 李春光，《古籍叢書述論》（瀋陽：遼瀋書社，1991），頁 327-342。
5. 同注 4，頁 342-353。
6. 中華圖書館協會編，《圖書館學季刊》（據北平市中華圖書館協會版影印，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